

宇文所安的文学翻译思想¹

魏家海

(武汉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内容摘要: 宇文所安是美国著名的唐诗研究专家和翻译家。他的翻译思想内容丰富深刻, 但我国翻译理论界对此关注很不够。本文从翻译的作用、文学文化的可译性、译者的角色和文学翻译的效果四个方面探讨了宇文所安翻译思想, 这种研究对中国典籍的英译和对外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宇文所安; 翻译; 文化; 传播

一、引言

宇文所安是美国著名的唐诗研究专家和翻译家, 他编译的《中国文学选读》和《中国文论选读》为中国古典文学的西传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唐诗)的研究和翻译同步进行, 虽然没有提出一套翻译理论, 但他的翻译思想内容丰富深刻, 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然而, 目前我国翻译理论界对他的翻译思想关注得很不够, 虽然有几篇硕士论文或研究论文略有涉猎(席珍彦, 2005; 马伟, 2007; 朱易安, 马伟, 2008; 潘晓莹, 2008), 还有的著作中有所论述(孔惠怡, 1998; 朱徽, 2009), 但这些研究颇为零碎, 缺乏系统性的总结, 未从比较文化研究语境的高度进行探析和归纳。因此, 探讨宇文所安的翻译思想有助于研究他的翻译策略和翻译影响以及同唐诗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 并对中国文学的外译和对外传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文学翻译的作用

2.1 翻译是中国古典诗歌成为“世界诗歌”的前提

“世界诗歌”是宇文所安提出的一个文学概念, 即“世界诗歌”是具有民族风味的异国情调, 加上国际通行的地域色彩的名字、意象和传统, 且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以后, 还具有诗的形态的诗歌(Owen, 1990:28)。宇文所安还认为, 真正国际性的诗歌“不仅是靠译者出色的功力, 它们有自行翻译的本领”(Owen, 1990)。这种消除过多地域色彩的“自行翻译的本领”就是诗歌本身所具有的国际性, 即世界性的诗歌。尽管这种强调中国诗歌独特性的看法颇受争议(张隆溪, 2004: 28-29), 但他后来还是坚持并发展了“世界诗歌”的概念——既不可“太普通”, 又不可“异国情调太浓”, 二者要达到“中和(commensurate)”。(Owen, 2003:537)多少有点歌德所倡导的“世界文学”的味道, 这种“中和性”是诗歌的“世界性”的重要特征。

他还把这种诗歌和中国饮食作了类比, 指出中国诗歌译为英语, 如同中国饮食在西方, 既保留了中国的基本特色, 又融合西方的成分, 可谓中西合璧, 非中非西, 亦中亦西, “中国性”与“国际性”融为一体。这实际上是诗歌翻译的目标。

此外, 他还指出, 民族诗歌要得到国际承认, 只有通过翻译才有机会获得这种评判。而“国际公认”意味着需要某种文化权力中心(如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认可和英语或其他国际语言的认可, 翻译当然是先决条件(Owen, 2003: 533)。所以, 翻译是民族诗歌迈向世界诗歌的重要途径。诗人的诗歌在译成英语后, 一旦被接受成为世界诗歌或国际诗歌, 诗人在国际上赢得的声誉也有助于提高其在国内的地位。宇文所安的看法同中国学者乐黛云的观点可相互印证: “在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补、互证、互识的过程中, 语言的翻译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乐黛云, 2004: 42)

¹作者简介: 魏家海(1965-), 湖北宣城市人, 硕士, 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文学翻译和翻译学。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英美的中国古代经典诗歌英译研究”项目成果之一(批准号: 06JA740036)

2.2 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对“中国性”和“世界性”的体现

中国古典诗歌在世界文学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中国性”(Chineseness),即感知到时代、体裁、风格,尤其是作家个性的差异,是中国古诗的精髓。宇文所安认为:“作为译者,我确信这些作品的‘中国性’会得以显现:我的任务是发现这个谱系差异的语言风格。”(Owen, 1996: xliii)换言之,他的译诗既追求原诗的“世界性”,又保留“中国性”,在译诗赢得国际承认的同时,通过体现各个诗人的风格而保存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

英译中国诗歌是“中国性”和“世界性”(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性)的有机统一,这需要译者同时具备中国文化心态和国际文化心态,通过翻译来实现。宇文所安在翻译中,不是固守封闭的中西文化差异,而是主张“文化共性”,以“世界诗学”的高度逐译中国诗歌,其翻译策略正是这种诗学的具体体现。

宇文所安在《中国文学选集》译例言中详细说明了使用近似“归化法”的翻译策略翻译中国的历法、度量衡、乐器、酒和动植物名称等,反对使用音译,如把中国的阴历正月译为三月,把二月译为四月,以表示春季;将中国的古琴译为 Harp(竖琴),将瑟译为 Great Harp(大竖琴);将“酒”译为 beer 和 wine。这种译法实际上就是把中国地域性改造成为“国际性”的典型案列,但它们之间毕竟存在文化共性。尽管这种“国际性”把中国文化系统纳入西方文化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英美特性,容易产生文化误读,但是,这样毕竟进入了国际文化系统的流通,有助于消除 Antoine Berman 所说的“每个文化以本民族为中心”的“特别的自恋情结”(张隆溪, 2005: 111),这不仅在文学上寻求共性,而且“努力消除文化对立的偏见,认识不同文化、尤其是东西方不同文化可能有共同性,有可以互相沟通的观念价值”(张隆溪, 2005: 67),实现异质文化的互识、互补和互用。

2.3 文学翻译作为功利手段对文学经典的重构

宇文所安认为文学文本(尤其是诗歌)的国际承认凭籍“诗学判断的政治学 and 经济学中相对新颖的构成成分”,这种判断“并不总是意味着翻译,但通常是翻译

(Owen, 2003: 533)”,这意味着文学经典在异文化里的重构离不开文学翻译。因此,文学翻译不可避免地带有“功利性”,因为“一位学者和翻译家可以非常爱好某一位作家的作品,但他对之进行的翻译介绍就可能会导致功利因素的介入”^A,这些因素不仅包括译者的审美观、文化名誉和特权,以及经济奖励等,而且包括译者的翻译动机。功利性是经典翻译重构的内在动因之一。

宇文所安把中国文学译文选集作为解构经典和重构经典的尝试,通过有选择地翻译中国经典作品来对中国传统的经典作品重新洗牌,既保留某些经典,又关注前人没有重视的作品,增加以往未入流的作品,以实现重构中国文学的目的,通过文学翻译重写中国文学史。虽然宇文所安的研究重点主要是中国古诗(尤其是唐诗),但他的研究视野很广,他的文学翻译作品选集从《诗经》到清代文学作品,跨越 2500 多年的中国文学史。在谈到古诗英译时,宇文所安认为,翻译中国古代诗歌必须首先对整个中国文学史有完整的认识,“所以翻译诗歌的同时,必须把所有中国文学都翻译过去,因为中国文人既写诗又写散文、小说、戏剧,《诗经》中的典故会反复出现在唐诗、宋词中。当然这不太现实”^B。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他的翻译胆识。

这种翻译理念反映在他的英译《中国文学选集》中,该选集比较全面,涵盖了从周朝到清朝的各类主要文体,这样的翻译选题不仅是由于译者的偏爱,而且具体体现了他的重构中国文学经典的翻译目的。尽管他一再声称译文集“既不是保守概念的经典(虽然相当全面地包涵那种意义上的经典作品),也不试图构建被压抑和被忽视的文本的反经典(虽然也有所体现)”(Owen, 1996: xli),但他通过编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方式,融入自己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重构经典文学,为重写文学史做铺垫,其意图的功利性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孔惠怡(1999: 121-126)所言,宇文所安“利用选材与翻译交织成的宏

观规范”，并且“利用翻译投射个人视野”，以“建构中国文学传统”。其“个人视野”显然离不开翻译的功利因素。

三、文学和文化的可译性

宇文所安不仅承认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可译性”，而且认为一切文学文本都具有“可译性”，正如他所言：“由于国家承认是国际承认的补充，文学文本不仅必须翻译，而且可以断言基本价值观在译文中依然存在”（Owen, 2003:532）。“可译性”是翻译中“价值观”存在的预设。接着，他进一步指出：“自从文学存在以来，在原文和译文中的文学已经并正在跨越文化和民族的疆界”（Owen, 2003: 535），文学文本的“跨越”显然是由翻译完成的，这昭示着文学文本具有“可译性”。“可译性”是文化共性的表征之一，它使不同的文学文本“在多元共存的基础上，必将实现多种文化的互看、互识、互补、互利”（乐黛云，2004: 43）。

“可译性”考验着译者的翻译能力。他认为施耐尔·马赫所讨论的倾向于将原语适应于客语规范和保留原语差异的矛盾，即刘若愚称之为“自然化”（naturalization）和“野蛮化”（barbarization），这两种极端的翻译策略都是糟糕的翻译，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折衷，对中国文学传统既有所“自然化”（归化），又要对其异国情调有所保留（异化），也就是说，译文既不太“地道”（common），又不可太“洋气”，原诗的可译性应该达到一种协调。不过，他本人更倾向于“适度”的“归化”（Owen, 1996: xliii）。但在翻译实践中，他对中国文化的转换远远超过他的“适度”标准而实际上以“接受语为取向”（Huang, 1998: 121）。虽然他的翻译以归化为主，且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可译性”的追求，但在总体上，他倾向于把中国诗歌与世界诗歌之间的“互译性”看成是异质文学和文化“互识”的前提条件，他的折衷式的“可译性”有利于中国文学和英语文学的“互通、互识、互补和互用”。

宇文所安认为，不仅当代文化是可译的，古典文化也应该是可译的，他批评了那种传统文化不可译的论调。他说：

在这个新的全球主义时代，民族国家被重新定义，随着民族国家文化就这一新的全球语境作出调整，传统文化成了民族国家借以展示自己的独特身份、拒绝被融入全球文化系统的一种抵抗模式。……传统文化的“国有者们”常常觉得最根本的东西是不可译的。（宇文所安, 2003:347）

在宇文所安看来，传统文化国有化的观点，抵抗通过翻译使之融入全球文化系统，显然是行不通的。这种开放性的翻译观得到中西学者的广泛支持。张隆溪（2005: 111）批评语言上的纯粹主义者和文化上的纯粹主义者，“总是坚持语言的独特性和不可译性”，但实际上，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交往却依靠“寻求外来和自我之间的共同点”而“一直存在”。语言和文化的国有化显然站不住脚。Apter（2006）甚至认为，借口维护民族文化而拒绝翻译无异于“文化自杀”。因此，文化之间无论具有多大的差异性，其共同点一直是存在的，并构成可译性的基础。为此，宇文所安进一步阐述了传统文化的可译性：

我可以想见，在那时，传统文化被当做共同分享的财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是地方化的、国有化的财富。这对于音乐和视觉艺术来说比较容易，但是文学则面临翻译的问题，而翻译，如我先前所说，是把我们当前的文化划分为国家和国际的一个象征性分水岭。（宇文所安, 2003:349）

换言之，翻译把传统文化由“国家文化”变成了共同分享的“国际文化”。随着翻译功能的提升，文化的“不可译性”在不断减少，“可译性”逐步增强。这意味着“可译性”不仅是一种权力关系，一方面，弱势文化把它视为“威胁”，“危害它们的民族身份”，（Ziegler, 1999: 9），另一方面，它又是民族文化迈向国际文化的重要方式，也是提升国

际地位、发挥影响力的大好机会。由此可反观和重新审视 Venuti 的翻译思想，Venuti 主张以“阻抗式”的异化翻译策略来保固民族文化的思想显然有失偏颇，以人为方式“不译”民族文学和文化，以突显译文的“异质性”，实质是制造“不可译性”来对抗西方文化，其弱势心态不仅不能真正传承民族文学和文化，也不利于把民族文化推向世界，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赢得传播机遇和话语权。

宇文所安预测，“关于翻译以及文学（尤其是诗）之不可译性的焦虑”，在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所蕴涵的真实性“会随之减少”（宇文所安，2003:350）。换言之，“可译性”逐步增大，文化的“可译性”带来“文化资本”在不同类型的文学和文化中的流通和交流，重点是文化间的“互通、互补和互用”。而“文化资本”通过翻译进行分布和调控，往往需要三个条件：“读者的需要、翻译的赞助人和发起人以及源语和目标语的语言和文化的相对声望”。（Lefevere, 2001:44）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加上译者的翻译能力，一种“文化资本”就可在另一种“文化资本”里流转，最终实现“互补”和“互用”的目的。宇文所安的“可译性”的价值就在这里。

四、译者的角色

中国文学和英美文学在语言文化上存在着先天的异质性和差异性，决定了中西文学通约的困难性。中国古诗特有美学价值的复杂性和语言的幽古深奥性，就连普通中国人都感到有难度，更不用说一般的西方人了。宇文所安站在“世界诗歌”的高度，把中国诗歌的翻译看成是中西文学和文化的对话和交流，用平等的心态看待中国诗歌。他从事唐诗翻译、研究和教学，期望受众从中开启一扇通向中国文化的窗口，加深中国文化交流 and 理解，他甚至希望为美国总统讲唐诗，以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⁶他把文学翻译看成是国际政治，而译者就是国家关系中的调停者或斡旋者。

译文所安在访谈中说，译者的角色是“文学经纪人”⁷，而不仅仅是诗歌语言和美学的转换者。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文学经纪人”拥有特殊的权力，他有权决定选择翻译哪些作家来“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学。因此，译者的选择对沟通译出文学和译入文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译者既是文学“经纪人”，又是“代言人”。这意味着译者在翻译中，不仅是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中介人”，而且还担任原文的“代言人”，行使自己的职权，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在“卖方”（原文）和“买方”（译文）之间协商和妥协，把“生意”（翻译）做成功。他的这种观点同许多西方学者不谋而合。Spivak 把作为译者的自己看成是“文化掮客”（陈永国，2005：237），即“经纪人”，Simon（陈永国，2005：273）说，译者“作为在不同知识传统之间充当媒介并向强力民族‘回’报的‘文化掮客’”，会对“翻译的影响予以充分注意”。译者作为“文学经纪人”，使非西方的文学作品在西方的翻译流通中发挥的作用不可轻视，东方主义学者 Said 也曾经自喻为困惑的“经纪人”

（Apter, 2006: 104）。所以，译者“经纪人”身份发挥作用，必须协调原作和译作的关系。Lefevere（2001：49）指出：“译者不仅必须与不同的概念网络妥协，而且还须与不同的一般性的网络妥协”。译者的“妥协”实际上是承担“经纪人”或“代言人”的角色，这实际是译者的文化身份。

台湾学者余光中（2002）也写道：“译者未必有学者的权威，或是作家的声誉，但其影响未必较小，甚或更大。译者日与伟大的心灵为伍，见贤思齐，当其意会笔到，每能超凡入圣，成为神之巫师，天才之代言人。”说的就是译者担当文学文本中文学“代言人”。因此，宇文所安的译者“文学经纪人”和“代言人”的思想在东西方都产生了广泛的共鸣，其洞见之深刻可见一斑。

在全球化时代，欧美的强势文化造成了文化资本分布的失衡，更需要译者以高度的国际责任感，来改变这种不平衡态势。译者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关涉到文化全球化的公平性，

以及弱势文化里文学交流中的国际化程度和命运。在宇文所安看来,译者作为经纪人的身份可以使中国诗歌同英美文学协商,既传递“中国性”,又有某些西方元素,两种文化权力达到一定程度的妥协和协调,使得中国文学成为全球共有的文化资本——“国际文学”——的一部分,而不仅仅属于中国一个国家的所有物,使文化共享成为“互补、互通、互用”的国际文化资本,这有利于中国文学在西方的传播,提高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国际地位。

五、文学翻译的效果

5.1 文学翻译语域和风格的多样性

宇文所安十分注意中国文学的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语域区别和功能,他认为,二者的关系大致类似于美国人用书面英语写散文,用美语写小说和戏剧,不同的“语域”适合不同的语体和语境(Owen, 1996: xli)。宇文所安具有很强的体裁意识、文体意识和语境意识。他在翻译中尽量避免使用古体字,但并不把译文处理为一个风格模版,而是采用不同风格翻译不同时代和语域的中国文学文本,“把文言文翻译成英语,把白话文翻译成美语”

(Owen, 1996: xliii)。宇文所安译文风格的多样性,或多或少受到庞德翻译思想的影响,迥然有别于其他美国汉学家,把多样性的原文风格翻译成统一的模式。总之,他的译文展示了不同诗人的不同风格。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翻译诗歌的难处在于忠实传达诗人的风格。中国读者在阅读唐诗的时候,知道各个诗人风格的不同。王维的诗非常温柔节制,李白的诗则非常豪放飘逸。所以在翻译的时候,我会尽量把这种风格的差异反映出来,让英文读者也能像中文读者那样体会到每个诗人风格的不同。”^[5]这种强调读者意识的翻译思想类似于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论和“读者反应”论。

有学者评论道:“宇文所安通过使用各种不同的语域,从正式的英语文学文体到美国口语,反映中国不同诗人的不同文体风格,即使对非英译的本族语读者来说,也是很有吸引力的方法”(Fuehrer, 1997: 470)这种多样性不仅丰富了译文的语言形式,增强了原文的再现效果,而且有利于引导读者品味原文里各类诗人不同的语体风格,同时为译语提供了语言异化的机会。这同 Venuti 有关“异化”翻译概念的新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妙。Venuti 认为,“异化”离不开“归化”的协调,“译文中不管表现什么差异,都打上了接受语文化的烙印”,异化的效果不仅意味着吸收原文的词汇和句法,而且还要使用译文中的当代语言的非标准形式和方言。(郭建中, 2009: 37)

5.2 文学翻译的透明性和本土性

宇文所安在论述唐诗阅读时说:“意义的稳定性是一种幻想。”因此阅读是“透明性的”,因为透明性的阅读“同西方诗学的分离式的隐喻操作有着根本的不同。在非小说的中国抒情诗中,文本是完整世界的有限窗口,从远处看很朦胧,但我们一走进就觉得明亮和清晰”(Owen, 1979: 239)。也是说唐诗通过阅读可以变得透明,通过翻译可以成为“透明”的英语诗歌,因为他的译诗语言流畅,可读性强,很少使用注释,适合美国大学生和普通读者欣赏,便于在美国传播,这也表明了 Venuti 反对“透明式”翻译策略的激进观点的偏颇性。这种“透明”式的译文最宜在美国本土化。

“本土化”的翻译注重意义的翻译,而不仅仅停留在句法层次上。在针对某些学者所谓“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命名式“精确”的论调时,宇文所安指出:鉴于文学语言的复杂性同命名语言具有本质的相异性,这种相异性表现在“命名在于‘准确’的语言,但文学语言的翻译却不准确”(Owen, 1979: 258)。例如,唐诗中的“翠鸟”译为 halcyon 或 kingfisher,尽管字面上很忠实、准确,但没有诗味,远不及译为 azure bird 富有诗意和本土文学诗性。总之,“翻译意味着变化,但是不一定意味着异国风味”(宇文所安, 2003: 349-

350)。

关于中国诗歌的句法翻译，宇文所安认为，译文往往需要对原文的句法进行重组，“保留汉语的句法形式通常是误译原文的诗行”。他还区分了“文学翻译”和“直译”两个概念，前者是使中国诗适应于英语诗歌的美学价值，后者是极力主张用英语语言形式“传递”原诗。(Owen, 1979: 260)显然，他主张以“文学翻译”的方法，用英语的审美价值表达原诗，以利于本土读者的欣赏和品味。

六、结语

宇文所安充分重视翻译在传播中国文学中的重要作用，他站在“世界诗歌”的高度英译唐诗，在翻译策略中协调“中国性”和“世界性”，通过编译中国经典以重构中国文学经典，为重写中国文学史做铺垫。宇文所安不仅承认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可译性，而且认为一切文学文本都具有“可译性”。译者是文学经纪人和文化代言人，使中国文学的文化资本在英语文化里流通和传播。他的译文重视再现中国文学语域和风格的多样性，译文倾向于透明性和本土性。他为中国文学在当代美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A 龑缺《我在思考未来诗歌的一种形态——宇文所安访谈录》，《书城》，2003年9月。

^B 石剑峰《关注那些被文学史过滤了的诗人》，《东方早报》，2007年11月6日。

^C 唐勇《专访汉学家宇文所安：我想给美国总统讲唐诗》，《环球时报》2006年9月3日。

^D 同^①

^E 同^③

参考文献:

1. Apter, Emily. *The Translation Zon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2. Fuehrer, Bernard. Review: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by Stephen Owe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0, Special Issues: Reappraising Republic China (Jun. 1997): 470-471.
3. Huang, Eva.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Book Review.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1998, Vol. 7, Part I.
4. 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Some Aeneids in English[A]. Susan Bassnet & Andrew Lefevere. (ed.)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5. Owen, Stephen. Stepping Forward and Back: Issues and Possibility for "World Poetry". *Modern Philology*, Vol. 100, No. 4, Toward World Literature: A Special Centennial Issue (May, 2003): 532-548.
6. Owen, Stephen.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New York: Norton, 1996.
7. Owen, Stephen. What is world poetry? [J]. *The New Republic*, November 19, 1990: 28-32.
8. Owen, Stephen. Transparencies: Reading the T'ang Lyric[J].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79(2): 231-251.
9. Owen, Stephen. A Defense[J]. *Chinese Literature*, 1979(2): 257-261..
10. Owen, Stephen. What is World Poetry?[J]. *The New Republic*, November 19, 1990.
11. Ziegler, Heide. *The Translatability of Cultures*[C]. Stuttgart: Metzler, 1999.
12. 陈永国. 主编. 翻译与后现代性[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13. 郭建中. 异化与归化: 道德态度与话语策略[J]. *中国翻译*, 2009(2): 34-38.
14. 孔惠怡. 文学·翻译·文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5. 马伟. 宇文所安的唐诗译介[D].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7.
16. 龑缺. 我在思考未来诗歌的一种形态——宇文所安访谈录[Z]. 书城, 2003年9月.
17. 潘晓莹. 宇文所安和许渊冲唐诗英译对比研究[D]. 武汉理工大学, 2008.
18. 席彦珍. 宇文所安中国古典文学英译述评[D]. 四川大学, 2005.
19. 石剑峰. 关注那些被文学史过滤了的诗人[N]. 东方早报, 2007年11月6日.
20. 唐勇. 专访汉学家宇文所安: 我想给美国总统讲唐诗[N]. 环球时报, 2006年9月3日.
21. 余光中. 余光中论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
22. 宇文所安. 把过去国有化: 全球主义、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命运[A]. 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C].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23. 宇文所安. 著. 王柏华. 陶庆梅. 译. 中国文论: 英译与评论[Z].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24. 乐黛云. 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十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25. 张隆溪. 走出文化的封闭圈[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2004.
26. 张隆溪. 中西文化研究十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7. 朱易安. 马伟. 论宇文所安的唐诗译介[J]. *中国比较文学*, 2008, (1).
28. 朱徽. 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Stephen Owen's Literary Translation Thoughts

Abstract: As a famous American expert in Tang poetry study and translator, Stephen Owen's translation thoughts are varied, but adequate research on them have not been given in China's translation theory circle so far.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translation function, the translatability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e translator's role and the effect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be significant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the diffusion of Chinese classic works.

Key words: Stephen Owen; translation; culture; diffusion

